

# 范仲淹、张载思想授受关系的历史考察\*

◎ 范立舟

**内容提要** 范仲淹、张载有着思想学术上的授受关系的说法起自《宋元学案》，然而，张载谒见范仲淹并得其亲炙的叙述的史源则来自作为张载弟子吕大临所撰的《横渠先生行状》。不仅所记张载年龄和谒见时间都不正确，而且谒见的地点也大有疑问。所谓范仲淹以《中庸》授张载的说法也疑问重重。吕大临在张载歿后归师二程，居然追述作为长辈的张载见到后辈二程讲学后，“尽弃其学”。这种言过其实的说法，给予我们的提示是：吕大临将先师张载的学说说成是受到范仲淹启发的结果，实际是抬高和烘托张载及思想学说高大正面的形象，这样，作为关学和洛学双重传人的吕大临的形象也就确立起来了。

**关键词** 范仲淹 张载 《中庸》 二程 高平门人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3-0001-08

DOI:10.15895/j.cnki.rwzz.2017.03.001

关于居宋明理学史上重要地位的“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的思想渊源，史书记载一向比较含混，直至承继黄宗羲未竟之业编修《宋元学案》的全祖望，才用肯定的语气宣示横渠之学出于范仲淹。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首序录中说“晦庵(朱熹)推原学术，安定(胡瑗)、泰山(石介)而外，高平范魏公(仲淹)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sup>①</sup>《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明确地将张载列为“高平门人。”<sup>②</sup>黄百家的按语更是断言“先生少喜谈兵，本趺驰豪纵士也。初受教于范文正，遂翻然知性命之求，又出入于佛、老者累年。继切磋于二程子，得归吾道之正。”<sup>③</sup>《宋元学案》卷三之《高平学案》原为全祖望所撰，但原稿已失，今本为王梓材补修，他把张载和富弼、张方平、李觏、贾黯等人均列为“高平门人”以张大其门户。<sup>④</sup>

在王梓材和冯云濠编撰的《宋元学案补遗》里，同样将张载列为“高平门人。”<sup>⑤</sup>《宋元学案》和《宋元学案补遗》的编撰者均生于张载所生活的时代数百年之后，又何以如此肯定地将张载系于“高平门人”而确信不疑？

关于张载受学于范仲淹的记载，首出于曾为张载弟子的吕大临。据吕大临言，横渠年少时，即无所不学，卓犖不群，“与邠人焦寅游，寅喜谈兵，先生说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群经统类文献整理与宋明儒学研究”(13&ZD061)

①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首《序录》，陈金生、梁运华、李哲夫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②③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17《横渠学案上》陈金生、梁运华、李哲夫点校，第662、664页。

④ 参见[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陈金生、梁运华、李哲夫点校，第153页。

⑤ 参见王梓材、冯云濠编撰《宋元学案补遗》卷17《横渠学案补遗》沈芝盈、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2012年，第1323页。



其言。当康定用兵时,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公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以为未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sup>①</sup>张载生于天禧四年(1020),“年十八”应为景祐四年(1037)。元昊称帝叛宋是在宝元元年(1038),元昊破金明寨,围延州(治今陕西省延安市),歼宋援兵于三川口(今陕西省延安市西约20公里处)是在康定元年(1040)正月。是年三月,应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1008-1075年)举荐,范仲淹复官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治今陕西省西安市);五月己卯,“以起居舍人、知制诰韩琦为枢密直学士,陕西都转运使、吏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sup>②</sup>所以,张载不可能于其年18岁时拜谒范仲淹,范仲淹此年(景祐四年,1037)尚在知饶州(治今江西省上饶市)任上,又调知润州(治今江苏省镇江市)。<sup>③</sup>宝元二年(1039)三月,只在知润州任上停留未及一年的范仲淹又被朝廷移知越州(治今浙江省绍兴市)。<sup>④</sup>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时间差,故而《宋史·道学传》将张载拜见范仲淹的年龄调整到“二十一岁”:“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sup>⑤</sup>无论是吕大临还是《宋史·道学传》的实际作者都没有讲明张载是在何处谒见范仲淹的。由于范氏于康定元年(1040)五月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未至永兴。癸丑,改为陕西都转运使高若讷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sup>⑥</sup>作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治所,是在延州。富弼所撰《范文正公墓志铭》:“宝元初,羌人压境叛,间岁悉众寇延州,太将战没,关中警严,于是还公旧职,移知永兴军,道授陕西都转运使。议者谓将漕之任,不预戎事,遂改充经略安抚副使,乃迁龙图阁直学士、吏部员外郎以宠之。至部,首按鄜延。时延安始困兵火,障戍扫地。城外即寇壤,岿然孤垒,人心危恐,废食待窜。凡朝廷追守,

皆以事避免,迁延不时往。公遂留不行,骑奏愿兼领延州事,以待寇之复来,上嘉而从之。”<sup>⑦</sup>欧阳修所撰《神道碑铭》也说:“赵元昊反河西,乃以公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迁龙图阁直学士。是时,新失大将,延州危。公请自守鄜延扞贼,乃知延州。”<sup>⑧</sup>安抚使乃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职官制度,隋、唐就有设置,宋代沿用,并且开始出现由文官担任一路首州知州兼任安抚使,总一路兵、民之权的趋势。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以文臣为经略”,节制武将的“祖宗之法”。<sup>⑨</sup>范仲淹知延州,就是体现这项制度设计的一项安排。范氏康定元年(1040)年到达延州,就有《延州谢上表》:“伏奉敕命,就差臣兼知延州军州事,已到任交割管勾讫。”<sup>⑩</sup>南宋楼鑰所撰的《范文正公年谱》径将张载晋见范仲淹系于是年:“是岁,横渠先生张载来谒,劝读《中庸》。吕与叔作《横渠先生行状》云:‘康定用兵时,先生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公知其远器,欲成就之,友责之曰:儒者

① [宋]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宋]张载《张载集》附录,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第381页。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7,康定元年五月己卯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3013~3014页。

③ 景祐四年(1037),范仲淹于饶州州治建庆朔堂。离任后有诗云“庆朔堂前花自裁,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忆着成离恨,只托清风管勾来。”见[清]范能瀆编集《范仲淹全集》言行拾遗事录卷一《怀庆朔堂诗》,薛正兴点校,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798~799页。范氏又有《饶州谢上表》:“昨奉敕命,落天章阁待制,守本官差知饶州,已到任礼上讫。”见[清]范能瀆编集《范仲淹全集》文集卷16,薛正兴点校,第343页。是年十二月,因京师地震,为因应天道,“徙知饶州范仲淹知润州。”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景祐四年十二月壬辰条,第2843页。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宝元二年三月丁未条,第2899页。

⑤ [元]脱脱《苏轼》卷427《张载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2723页。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四月壬子条,第3009页。

⑦ [清]范能瀆编集《范仲淹全集》褒贤集卷1,富弼撰《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薛正兴点校,第945页。

⑧ [清]范能瀆编集《范仲淹全集》褒贤集卷1,欧阳修撰《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薛正兴点校,第937页。

⑨ 关于宋代安抚使的形成、渊源和发展,可以参见李昌宪:《宋代安抚使考》,齐鲁书社,1997年。

⑩ [清]范能瀆编集《范仲淹全集》文集卷16,薛正兴点校,第345页。

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即是年也。”<sup>①</sup>显然,此处楼鑰乃是袭用吕大临撰写的张载行状,连吕大临将张载年龄写错这样一个明显的错误都没有发现和改正。此年范氏戎马倥偬,席不暇暖。在延州整军备战,“自兼守延安,莫遑寝食。城寨未谨,兵马未精,日有事宜,处置不暇。而复虞内应之患,发于边城;或反间之言,行于中国。百忧具在,数月于兹。而方修完诸栅,训齐六将,相山川,利器械,为将来之大备。”<sup>②</sup>夺回塞门诸寨,修复已破荡的金明寨、万安城等。<sup>③</sup>九月,遣任福破白豹城(今甘肃省华池县东北约25公里处)。迫使入侵保安(治今陕西省志丹县)、镇戎军(治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之西夏军撤兵。<sup>④</sup>又遣狄青(1008-1057年)等攻取西界芦子平。<sup>⑤</sup>遣种世衡(985-1045年)兴筑青涧城(在延州北约100公里处),营田实边。<sup>⑥</sup>十月,遣朱观等攻破西夏洪州界郭壁等十余寨。<sup>⑦</sup>范仲淹在延州,日理万机,“如治乱绳”,“夙夜敢宁,奔驰罔暇,刻时莅事,翌日兴师。”<sup>⑧</sup>这年冬天,韩琦主张出兵进攻西夏,寻找夏军主力决战以扭转被动局面。范仲淹则仍然坚持积极防御,双方往返磋商多次,最终韩琦的意见占据上风,遂有第二年的好水川之战。在这样的境地下,范仲淹是否能够拨冗延见张载这样一位当时毫无功名的士子,是一个非常可疑的问题。更何况自宝元元年(1038)六月,元昊叛宋以后,时任陕西转运使的张存就上言:“切见泾、原、环、庆诸州驻扎兵马不少,其当职之官多务修葺城池,欲为固守之计,并未见训厉兵马,使令精锐,及未见于蕃贼出入一州道路,预为控厄防其奔冲,切缘陕西次边,及里州军,如邠、宁、泾、耀、鄜、坊等州,虽有城池,不甚牢壮,受敌复又至边界地里不远,恐使蕃贼得知乘其无备,分头以劲马奔冲,北至沿边,出兵邀遮,其内地乡川已遭劫掠,内地一扰,人何以堪?乞令陕西诸路兵马总管司常切训厉,所管兵马器甲,悉令精锐,蕃贼出入山川道路,亦须控扼,遇有蕃贼入界,并须昼时会合,掩杀扼截,即不得以守护城池为名,端坐不出,纵令贼马奔冲内地,劫掠人民,若有违犯,其出入地分总管鈐籍、都监、巡检等,并乞重置于法。诏下鄜、延、环、庆路沿边安抚司施行。”<sup>⑨</sup>也就是说,实际上自宝元二年(1038)七月

起,陕西北部、西北部缘边地区事实上已是路途阻塞,闲杂人等是难以从关中信步抵达延州的。而且今《张载集》中,倒是没有张载于康定元年(1040)前谈论军事话题的文字,收录的是及冠之年后的数篇涉及边事的文章,有撰于庆历二年(1042)的《庆州大顺城记》,颂范仲淹军功;又有《边议》《与蔡帅边事画一》《泾源路经略司论边事状》《经略司画一》等,均撰写于庆历二年以后,这说明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边事的关注和建言。<sup>⑩</sup>并没有做一个淳儒,从此放弃谈兵,沉湎于儒学典籍之中。又据两宋之际的晁公武说,张载还有《注尉缭子》一卷,后佚。<sup>⑪</sup>《尉缭子》乃是古代兵书,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杂家和兵形势家,前者记29篇,后者记31篇。北宋战事频繁,兵书受到重视,元丰三年(1080)“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sup>⑫</sup>是

① [宋]楼鑰《范文正公年谱》,[清]范能濬编集《范仲淹全集》,薛正兴点校,第737~738页。

② [清]范能濬编集《范仲淹全集》文集卷16《耀州谢上表》,薛正兴点校,第347页。

③ 参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8,庆历元年春正月丁巳条、戊午条,第3079~3081页。

④ 参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8,康定元年九月壬申条,第3044页。

⑤ 参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8,康定元年九月庚申条,第3039页。

⑥ 参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8,康定元年九月庚午条,第3043页。

⑦ 参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9,康定元年冬十月乙酉条,第3051页。

⑧ [清]范能濬编集《范仲淹全集》文集卷16《延州谢上表》,薛正兴点校,第346页。

⑨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二七之二五,二七之二六,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⑩ 《边议》有“种世衡守环州”云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5,庆历二年是春条:“是春,范仲淹巡边至环州,州属羌阴连敌为边患,仲淹谓种世衡素得属羌心,而青涧城已坚固,乃奏世衡知环州以镇抚之。庞籍请留世衡,诏仲淹更择人,仲淹言非世衡则属羌不可怀,诏从仲淹所请。”可知种世衡守环州是在庆历二年(1042)春。《与蔡帅边事画一》和《泾源路经略司论边事状》都提到“谅祚身死”“谅祚已亡”。按:西夏的第二位皇帝谅祚死于宋治平四年(1067)十二月。可知张载这两篇文章肯定是写于治平四年十二月后。

⑪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卷14《兵家类·张横渠注《尉缭子》》,孙猛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38页。

⑫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0,元丰三年夏四月乙未条,第7375页。



为《武经七书》。而张载为《尉缭子》作注,说明他始终关注军事。

庆元元年(1041)二月,韩琦令环庆路副总管任福率一万八千人出击正在进攻渭州(治今甘肃省平凉市)的元昊主力,大败于好水川,“将校士卒死者万三百人,关右震动,军须日广,三司告不足,仁宗为之盱食。”<sup>①</sup>于是韩琦连同范仲淹均被降官,“降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范仲淹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如故。”<sup>②</sup>时间是庆历元年(1041)四月。因此,综上所述,康定元年(1040)21岁的张载是不可能永兴军和延州这两处谒见范仲淹的。自弱冠之年(1039)至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张载有18年的潜默期。尽管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边事的关注和建言,但大部分精力已经投放到了儒学精粹的研习上是可以肯定的,否则是很难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的。

### 三

另一个问题是,范仲淹会在与张载第一次见面时就授读《中庸》吗?为什么范氏会授读《中庸》而不是其他什么儒学经典呢?《宋史·范仲淹传》云:“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sup>③</sup>著有《易义》,其解《易》方法和宗旨对宋学的影响颇大;另有数篇以阐发《周易》思想为主旨的文章,如《四德说》《穷神知化赋》《乾为金赋》《易兼三材赋》《天道益谦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等。当然范仲淹也熟悉《中庸》。天圣六年(1028)他在南京应天府(治今河南省商丘市)掌府学时作有《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此文论及《中庸》的一段话是“道者何?率性之谓也。从者何?由道之谓也。臣则由乎忠,子则由乎孝,行已由乎礼,制事由乎义,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将从之乎,然后可以言国,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岂不大哉?若乃诚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让乎圣贤,蟠极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于心,而后可言焉。”<sup>④</sup>余英时对此文的评价是“全就《中庸》发挥,充分表达了由修身、齐家而建立理想秩序的意识,而且也含有‘内圣’与‘外王’相贯通的

观念。”<sup>⑤</sup>但是,细绎此文,我们可以发现,这段话既涉及到对“率性之谓道”的解释,同时还阐述了道的“礼义信仁”等具体内容。道来源于哪里呢?按照《中庸》的思路,道来源于人性,人性来源于天。而范仲淹在此抛弃了这种思路,他更倾向于联系《易》来进行阐述“所以明乾坤之化育,见天人之会同者也。”<sup>⑥</sup>这里的“乾坤”具有化育之功能,它指的是阴阳之气。范仲淹以乾坤为宇宙本体,为“真宰”和“造物”者,“至阳之位,冠三才而中正,秉一气而纯粹,万物自我而资始,四时自我而下施。”<sup>⑦</sup>所以,在天人关系的看法上,范仲淹承继的是《易传》的思路,而不是《中庸》的思路。范氏文集中并没有正面论述《中庸》的文字。范氏通达《中庸》旨意,自不待言。但是范氏最擅长者,乃是《周易》,为何见张载时不先授以《周易》这部理深意涵、体大思深之“群经之首”的典籍而以《中庸》为说?在面对后学者请益的时候,不是介绍自己最熟悉、最有心得的典籍,而介绍的是自己很少提及的文献,这又作怎样的理解呢?还有,《四书》自中晚唐以降至于北宋,有一个明显的“升格”过程,北宋是四书学的酝酿期。但至少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时期,《大学》《中庸》还不是两部极其重要而又独立的经典。郑熊认为“宋儒研究《中庸》的学术背景主要有三方面:儒学危机、《中庸》及汉唐《中庸》学、义理之学的兴起。就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它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是环环相扣的。可以说,正是由于佛教与道教教义理论的发达,尤其是佛、道二教本体理论和心性理论的发展与成熟,构成对儒学独尊地位的

①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第13997页。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1,庆历元年夏四月癸未条,第3114页。

③ [元]脱脱《宋史》卷314《范仲淹传》,第10267页。

④ [清]范能瀆编集《范仲淹全集》文集卷8,薛正兴点校,第151页。

⑤ [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第89页。李存山也说范仲淹特别重视《中庸》并举《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为例,参见李存山《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⑥ [清]范能瀆编集《范仲淹全集》别集卷3《易兼三才赋》,薛正兴点校,第437页。

⑦ [清]范能瀆编集《范仲淹全集》别集卷2《乾为金赋》,薛正兴点校,第434页。

挑战;而儒学自身的本体理论从先秦到唐代不仅没有得到强化,而且有不小的萎缩。经学也由于章句训诂注经方式的大行其道,使儒学也变得日趋衰落,这就使得儒学的理论色彩在佛教与道教面前比较逊色。儒学要强化其理论成分,就需要提升其本体论,而北宋儒家学者对《中庸》的探索正是为了实现此目标。而《中庸》之所以能够承担这一重任,就是因为《中庸》思想本身具有本体色彩,宋儒对《中庸》的重视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sup>①</sup>宋明理学史研究,早就注意到了四书学的兴起与北宋心性之学发展之间的关系。程颢、程颐兄弟对四书的尊崇和表彰令人印象特别深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sup>②</sup>（程）颐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sup>③</sup>《二程集》中,对《中庸》多有论述,如“《中庸》之言,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sup>④</sup>“《中庸》之书,其味无穷,极索玩味。”<sup>⑤</sup>“《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sup>⑥</sup>二程高足吕大临、杨时等人都擅长《中庸》研究,都著有相关著作,这些著作事实上就是对程颢、程颐兄弟《中庸》理论的进一步阐释。杨时的《中庸义》序言讲到“追述先生之遗训,著为此书,以其所闻,推其所未闻者,虽未足尽传先生之奥,亦妄意其庶几焉。”<sup>⑦</sup>对于二程在《中庸》学术发展史上的贡献,胡安国总结道“《中庸》之义,不明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其义可思而得。”<sup>⑧</sup>朱熹也说“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传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遗旨而发挥之,然后其学布于天下。然明道不及为书,今世所传陈忠肃公之所序者,乃蓝田吕氏所著之别本也。”<sup>⑨</sup>也就是说,今本《河南程氏经说》中载录的《中庸解》不是程颢亲笔所书,而是出自吕大临的手笔。南宋胡宏指出:“靖康元年,河南门人河东侯仲良师圣自三山避乱来荆州,某兄弟得从之游。议论圣学,必以《中庸》为至。有张焘者,携所藏明道先生《中庸解》以示之,师圣笑曰‘何传之误,此吕与叔晚年所为也。’焘亦笑曰‘焘得之江涛家,其子弟云然。’”<sup>⑩</sup>侯师圣,名仲良,“师圣少孤,养于夫子家,至于成立。两夫子之属纊,皆在其左右,其从夫子最久而悉知夫子文章为最详。”<sup>⑪</sup>二程固然稔熟并且重视《中庸》,但

是程颢没有来得及写出心得,程颐写过阐扬《中庸》的著作,却没有流传下来,“伊川先生为《中庸解》,疾革,命焚于前。门人问焉。伊川先生曰‘某有《易传》在,足矣,何以多为?’”<sup>⑫</sup>《中庸解》是吕大临的作品,部分体现着程颐的思想。李侗说“某曩时传得吕与叔《中庸解》甚详。”<sup>⑬</sup>汪应辰“吕与叔《中庸解》”云云,<sup>⑭</sup>所有这些史料都指向这样的结论:二程极度重视《中庸》,但今本《河南程氏经说》中载录的《中庸解》出自吕大临。

张载本人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固然是很重视《中庸》的“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sup>⑮</sup>《宋史·道学传》对张载学术特征的总结是“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sup>⑯</sup>犹如郑熊所论,以《中庸》为体是张

① 郑熊《宋儒对〈中庸〉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7年,第34~35页。

② [元]脱脱《宋史》卷427《道学传》,第12710页。

③ [元]脱脱《宋史》卷427《程颐传》,第12720页。

④ [宋]程颢、[宋]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1,《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第130页。

⑤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8,《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222页。

⑥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11,《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第471页。

⑦ [宋]杨时《杨时集》卷25《中庸义序》,林海权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93~594页。

⑧ [宋]胡安国《奏状》,《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348页。

⑨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5《中庸集解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⑩ [宋]胡宏《杂文·题吕与叔〈中庸解〉》,《胡宏集》,吴仁华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189页。

⑪ [宋]胡宏《杂文·题吕与叔〈中庸解〉》,《胡宏集》,吴仁华点校,第189页。南宋李心传也说侯师圣在二程学统中占有一席之地“自熙宁、元丰间河南二程先生始以道学为天下倡。二先生少学于汝南周茂叔,其后学者翕然宗之。二先生死,其高弟门人前有河南先公揆,刘质夫、李端伯,京兆吕与叔、苏季明,上蔡谢显道,延平杨中立,建安游定夫,河东侯师圣。”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6《道学兴废》,徐规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第137页。

⑫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2《尹和静手笔辨》,四部丛刊初编本。

⑬ [宋]李侗《延平答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98册,第655页。

⑭ [宋]汪应辰《文定集》卷14《与吕逢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8册,第718页。

⑮ [宋]张载《经学理窟》,《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77页。

⑯ [元]脱脱《宋史》卷427《张载传》,第12724页。



载对汉唐儒学现状反思的结果。汉唐儒学太过质朴厚实,在天人关系上存在“知人不知天”的问题,<sup>①</sup>缺乏心性之学的深度。张载试图通过对太虚与气关系的梳理,建构了太虚这个本体论概念,实现了“知人”与“知天”的贯通。“以《中庸》为体”,意思是要借助《中庸》的思维模式实现天道与人性的合一,“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乃所谓诚。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诚身,不过不已于仁孝而已。故君子诚之为贵。”<sup>②</sup>在此,《中庸》之诚成为“天道”与“人道”的共同特性与两者实现内在贯通的潜在可能性之基础。尽管如此,在张载那里,《论语》《孟子》始终是要被高一格看待的“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论》、《孟》二书于学者大足,只是须涵泳。”<sup>③</sup>他表现出以《论语》《孟子》为基础对儒家经典进行统合的倾向,将《论语》《孟子》作为其他儒家经典的义理基础与衡量标准,凸显两者在儒家经典中的核心地位。朱熹在编辑《近思录》时,所列张载著作尚有《论语说》和《孟子说》,<sup>④</sup>后佚。张载的弟子苏昞撰《正蒙序》说“会归义例,略效《论语》、《孟子》,篇次章句,以类相从,为十七篇。”<sup>⑤</sup>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序论》中也认为,张载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涵盖了儒家经典的内容,体现着儒学的精髓“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孟》之要归也。”<sup>⑥</sup>这样的说法,都发现了张载学术著作及思想特质与《论语》《孟子》的关系要近于《中庸》。“张子之学,无非《易》也”一句,又揭示了张载学说与《周易》的密切关系。张载撰有《横渠易说》,时间在《正蒙》之前,嘉祐二年(1057),张载从关中去开封应试,“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sup>⑦</sup>《横渠易说》估计作于此之前。熙宁三年(1070)张载回到眉县横渠镇。“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怠也。”<sup>⑧</sup>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云“熙宁九年(1076)秋,先生感异梦,忽以书属门人,乃集所立言,谓之《正蒙》。”<sup>⑨</sup>《正蒙》是张载思

想的成熟之作,而他先前所作的《横渠易说》则代表着张载早些时候的探索,在与二程交谈的过程中,张载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覃思潜研,晚年终于出神入化,“从《易说》到《正蒙》,正说明张载哲学是在《易》学基础上成熟起来的。”<sup>⑩</sup>王夫之反复说“盖张子之学,得之《易》者深。”<sup>⑪</sup>“张子言无非《易》。”<sup>⑫</sup>这是切实地把握住了张载的思想历程和特征。

#### 四

张载之学出自高平(范仲淹)之说,从学术史书写的角度来看,是全祖望、王梓材、冯云濠等人“追溯”的结果。<sup>⑬</sup>但从史源学的层面审视,则是张载弟子吕大临的“首创”。史源学讲究寻考史料的来源。陈垣认为,研究史著应该认真寻考其所依据的史料来源,以考察其根据是否可靠,引证是否充分,叙述是否正确。<sup>⑭</sup>张载谒见范仲淹之说的史源,就是吕大临首先在《横渠先生行状》中揭示的。然而,这种说法,在两宋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被主流学者所

① 参见郑熊《“以为《易》宗,以为《中庸》体”探析——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齐鲁学刊》2011年第3期。

② [宋]张载《正蒙·诚明篇第六》,《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1页。

③ [宋]张载《经学理窟》,《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72页。

④ 参见[宋]朱熹、[宋]吕祖谦编《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卷五《省察》,程水龙集校集注集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07页。

⑤ [宋]苏昞《正蒙序》,林乐昌《正蒙合校集释》附录三,中华书局,2012年,第974页。

⑥⑪⑫ [清]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林乐昌《正蒙合校集释》附录三,第986、985、986页。

⑦⑧ [元]脱脱《宋史》卷427《张载传》,第12723、12724页。

⑨ [宋]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附录,章锡琛点校,第382页。

⑩ 刘学智《〈横渠易说〉与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⑬ 陈俊民就曾指出“张载之学出于高平之说,原来是全祖望、王梓材等‘追溯’出来的。”陈氏进而说“范仲淹知人善任,鼓励提携,这对张载进入理学活动,创立关学,成为著名理学家,诚然关系重大,但他们之间并无师承关系。”参见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8页。陈氏认为,存在张载与范仲淹见面的事实,但不存在两人之间有师承关系的事实。

⑭ 参见陈垣《史源学实习》,商务印书馆,2015年。

接受,在南宋受到广泛的质疑,汪应辰说“范文正公一见横渠,奇之,授以《中庸》,谓横渠学文正,则不可也。”<sup>①</sup>汪氏在承认他们见面的前提下,否认他们之间的授受关系。朱熹对周敦颐和二程之间的授受关系持论甚坚确,<sup>②</sup>但是对范、张授受关系并不坚持,就连他们是否见过面也语焉不详。朱熹在答复汪应辰的信中写到“又蒙喻及二程之于濂溪,亦横渠之于范文正耳。先觉相传之秘,非后学所能窥测。诵其诗,读其书,则周范之造诣固殊,而程、张之契悟亦异。如曰仲尼、颜子所乐,吟风弄月以归,皆是当时口传心受的当亲切处,后来二先生举似后学,亦不将作第二义看。然则行状所谓反求之六经,然后得之者,特语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处,则自濂溪不可诬也。横渠之于文正,则异于是,盖当时粗发其端而已。”<sup>③</sup>这里的意思是说,周程授受之内涵,是关系到理学核心要义以及这些要义所表现于人的洒落的行为方式,而即便范张见过面,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范、张授受不能成立,那么为什么这种叙述会出现在吕大临所撰的《横渠先生行状》里,并在全祖望、王梓材和冯云濠补修的《宋元学案》和《宋元学案补遗》得到强化呢?吕大临之所以有这样的书写,与其说是得自事实叙述,还不如说是出于价值叙述。吕大临(1044-1091年),字与叔,宋永兴军蓝田县(今陕西省蓝田县)人,与兄吕大忠、吕大钧俱是横渠先生张载之高足。横渠歿后,吕大临归二程门下,“学于程颐,与谢良佐、游酢、杨时在程门,号‘四先生’。”<sup>④</sup>嘉祐二年(1057)张载进士及第前的短暂时期,曾至开封府备考,“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与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与二程与道学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sup>⑤</sup>对待自己的长辈,二程是否会与张载就共同研究的同一部经典肆意地发表看法,作为长辈,张载又是否会轻易地被晚辈的才学所折服,都是未定之论。而且,最后张载居然与二程研讨后,“尽弃异学”。<sup>⑥</sup>而事实上,程氏兄弟对他的这位表叔是非常尊敬的,“神宗问明道以张

载、邢恕之学,奏云:张载臣所畏,邢恕从臣游。”<sup>⑦</sup>横渠未第时,就受知于名臣文彦博,及第后,经地方官的历练,很快又受知于北宋另一位名臣吕公著。熙宁二年(1069),正当王安石变法兴起之际,吕公著荐横渠于朝廷,“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可以召对访问。”<sup>⑧</sup>神宗于是召见张载,问以治世之道,张载“以渐复三代为对。”<sup>⑨</sup>关于“尽弃异学,淳如也。”之类的表述,也是最来自吕大临的《横渠先生行状》:“嘉祐初,见洛阳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先生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尽弃异学,淳如也。”朱熹有段按语“按行状今有两本,一云‘尽弃其学而学焉’,一云‘尽弃异学淳如也。’其他不同处亦多,要皆后本为胜。”<sup>⑩</sup>而根据程氏兄弟《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一:“吕与叔作《横渠行状》,有‘见二程尽弃其学’之语。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

① [宋]汪应辰《文定集》卷15《与朱元晦》(第十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8册,第724页。

② 朱熹撰《伊洛渊源录》明确了周程授受关系,《宋史·道学传》即据此成文。就在《伊洛渊源录》完成后不久,汪应辰致函朱熹,对周程授受提出质疑。朱熹再三回复。最后干脆认为,周程之间最起码有着实质的思想继承关系“濂溪、河南授受之际,非末学所敢议,然以其迹论之,则来教为得其实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书》、《太极图》之属,更望暇日试一研味,恐或不能无补万分,然后有以知二先生之于夫子,非孔子之于老聃、郑子、苾弘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0《答汪尚书十一月既望》)

③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0《答汪尚书(第八通)》,四部丛刊初编本。

④ [元]脱脱《宋史》卷340《吕大临传》,第10848页。

⑤ [元]脱脱《宋史》卷427《张载传》,第12723页。

⑥ 张载是程颢、程颐兄弟的表叔,即程氏兄弟父亲程珦的表弟。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5“横渠张先生名载,字子厚;弟戢,字天祺,为二程先生之表叔。”吴曾言“张戢天祺与弟载子厚,关中也,关中之谓之二张。笃行不苟,一时师表,二程之表叔也。子厚推明圣学,亦多资于二程。吕大临与叔兄弟,后来苏晒等从之学,学者号子厚为横渠先生。天祺为御史,正献吕公之荐也。二程与横渠,从学者既盛,当时名其学为张、程。”参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2《张程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第348页。

⑦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12,《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443页。

⑧⑨⑩ [宋]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宋]张载《张载集》附录,章锡琛点校,第382、382、385页。



无忌惮。”<sup>①</sup>这就表明,吕大临在张载死后从学二程,为了将二程一系神化为儒学正宗,不惜以贬低先师张载为代价。程门后学为神化其师,一贯有贬低其他学派的现象,如杨时在徽宗大观元年(1107)说过“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余录此简以示学者,使知横渠虽细务必资于二程,则其他故可知已。”<sup>②</sup>两宋之际的程门后学之一游酢就更加过分:“先生(程颢)生而有妙质,闻道甚早,年逾冠,明诚夫子张子厚友而师之。子厚少时自喜其才,谓提骑卒数万,可横行匈奴,视叛羌为易与耳。故从之游者多。能道边事,既而得闻先生议论,乃归谢其徒,尽弃其旧学,以从事于道。其视先生,虽外兄弟之子,而虚心求益之意,恳恳如不及逮。”<sup>③</sup>这都是为了强化二程一系是儒学道统所牵系而言过其实的说辞。而相反朱熹倒是有比较公允的辨析:“横渠之学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与伊川异。”<sup>④</sup>“明道之学,从容涵泳之味洽;横渠之学,苦心力索之功深。”<sup>⑤</sup>朱熹认为,很难单纯地判断二程与张载之学何者更接近圣人之学,何者更具备儒学的纯粹性,两者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张载之学也并非一定在二程之下,“横渠最亲切。程氏规模广大,其后学者少有能如横渠辈用工者。近看得横渠用工最亲切,直是可畏!学者用工,须是如此亲切。”<sup>⑥</sup>尽管同属儒学阵营,但双方的意见未必雷同,这并不妨碍儒学价值的伸张。

一方面,吕大临在张载死后从学二程,为了将二程一系神化为儒学正宗,不惜以贬低先师张载为代价。但是在另一方面,吕大临又是守横渠之说甚为坚确的学者。“先生学通《六经》,尤邃于礼,每欲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令可行,不为空言以拂世骇俗。”<sup>⑦</sup>张载之学“尊礼贵德”“以礼立教”,<sup>⑧</sup>构建完成了缜密的礼学体系,对于礼的基本观念和礼学功能的学理系统有完整的论证,对礼在实际生活中的实践功能的发挥,更是身体力行。吕大临亦然。“吕与叔守横渠学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才有说了,便不肯回。”<sup>⑨</sup>吕大临虽转师二程,尊崇二程,并成为程门高足,但也很难割舍关学的基本思想宗旨和感情联结,所以也维护张载学说,就像他为崇仰二程的思

想是出自儒学正宗而抑横渠在明道、伊川之下一样,他将先师张载的学说说成是受到北宋名臣范仲淹启发的结果,为的是抬高和烘托张载及其思想学说的高大正面的形象,这样,作为关学和洛学双重传人的吕大临的形象也崔嵬高耸了。至于在全祖望、王梓材和冯云濠补修的《宋元学案》和《宋元学案补遗》得到强化的原因,则是这类学术史著作体裁和形式上的需要,编撰者希望能以此赅续学统,张扬思想学术系统的完整和源远流长,而事实上,连全祖望都说过“张子之于范文正公,是当时固成疑案矣。”<sup>⑩</sup>因此,所谓的范张授受说,固出于后来者的虚构,即便是张载亲见范仲淹的事实,也是不能成立的。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晓洁

①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11,《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414-415页。

② [宋]杨时《杨时集》卷26《跋横渠先生书及康节先生人贵有精神诗》,林海权点校,第612页。

③ [宋]游酢《游廌山集》卷4《书明道先生行状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1册,第699页。

④⑤⑥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93,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第2362、2363、2363页。

⑦ [明]冯从吾《关学编》卷1《与叔吕先生》,陈俊民、徐兴海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11页。

⑧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粹言》卷1,《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1195页。

⑨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9,《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265页。

⑩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编》卷38《周程学统论》,《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铸禹会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35页。

